



《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

2025年中国好书3月榜
江苏人民出版社
洪银兴等著

以三个自觉书写新时代发展答卷

——评《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

《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一书甫一问世,便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深厚的理论性和鲜活的实践性引发广泛关注。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领衔撰写的著作,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的积极响应,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深刻探索。通过政治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三重维度,该书构建起一套立足中国实践、彰显江南特色的新型发展话语体系,为新时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

一、政治自觉:以“国之大者”锚定理论创新的坐标系

在当代中国,“政治自觉”绝非简单的意识形态表态,而是对国家发展方向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刻把握。该书最鲜明的特质,正是将人文经济学的研究置于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框架之下,展现出“国之大者”的政治站位。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提出“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既是对江苏既有发展成就的肯定,更是对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战略指引。《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作者团队以“八个多月”的惊人效率完成理论建构,其背后折射的正是对“政治三力”的生动诠释——既精准把握住人文经济学对破解“发展之问”的战略价值,又深刻领悟到这一命题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合,更以高效执行力将政治要求转化为学术成果。

这种政治自觉的核心,在于始终将“人民性”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点。书中反复强调的“经世济民”理念,既是对西方经济学将人异化为生产工具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发展。当西方经济学沉迷于GDP崇拜时,中国的人文经济学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在于“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在于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种价值立场的根本差异,使得该书的理论建构始终保持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形成深度共鸣。

二、理论自觉:在文明对话中重构经济学的叙事逻辑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一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经济学革命。该书的理论自觉,突出表现为对中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化。正如书中所言,尽管“人文经济学”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见诸西方学界,但其内涵已发生根本性嬗变。在马尔库塞批判的“单向度的人”的语境中,西方人文经济学始终难以摆脱工具理性的桎梏;而中国的人文经济学,则将“人”定义为具有主体价值的“最大多数人民”,将“文”升华为涵养精神世界的文明基因,将“经济”拓展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载体。

这种理论重构的突破性,集中体

现在三个维度的创新:其一,在价值论层面,打破“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提出“文化—经济”共生演进的发展观;其二,在方法论层面,超越实证主义的量化分析,构建起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其三,在实践论层面,摒弃“唯增长论”的发展迷思,确立起质量优先、效益为本的评估体系。特别是在对“苏南模式”的重新解读中,作者们敏锐捕捉到乡镇企业时代“离土不离乡”的文化密码,揭示出工业园区转型中“产城融合”的人文智慧,最终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图谱。这种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具有世界眼光的理论创新,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实践自觉:用江南智慧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注脚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而该书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将抽象的理论命题转化为生动的实践叙事。江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其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人文经济学教科书。从改革开放初期“苏南模式”的异军突起,到工业园区时代的创新突围,再到新时代“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建设,每个发展阶段都蕴含着经济与文化协同共生的实践智慧。书中对无锡实践的深度剖析,尤其凸显出这种实践自觉的当代价值——当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重塑产业形态时,惠山泥人、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地标依然焕发勃勃生机;当GDP增速让位于质量效益时,“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早已在苏南大地悄然生根。

这种实践自觉的根本特质,在于始终保持着“先行者”的探索勇气。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无锡通过“村企共建”模式实现的城乡均衡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太湖治理工程展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智慧;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推动的产文旅深度融合——这些鲜活的实践案例,既是对人文经济学理论的具体演绎,也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板。这种“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富生命力的发展逻辑。

四、三重自觉的统一:新时代发展方法论的系统创新

《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的深层价值,在于将政治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熔铸为有机整体,构建起新时代发展的方法论体系。这种系统创新的要义在于:政治自觉确立价值坐标,保证发展方向不偏航;理论自觉提供认知工具,破解发展难题有章法;实践自觉形成反馈机制,推动理论创新再深化。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形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观。

这种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当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陷阱”,当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中国奇迹,当传统发展模式遭遇生态瓶颈,人文经济学的江南实践给出了充满希望的答案:在无锡物联网产业集群中,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如何共生共荣;在江阴乡镇企业的转型中,我们读懂共同富裕如何从理念转化为现实;在苏州工业园区“双面绣”般的产城融合中,我们领略到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底蕴。这些生动实践印证着书中提出的核心命题:经济发展绝非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充满人文温度的文明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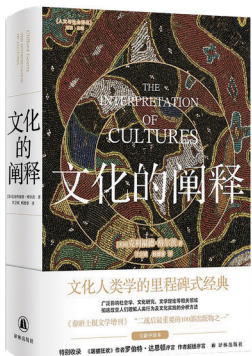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既是对江苏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诠释。它告诉我们:当经济学重新找回“经世济民”的初心,当发展实践始终锚定“人的全面发展”的坐标,当理论创新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我们就能够创造出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文明形态。这或许正是该书给予时代的最深刻启示——在人文与经济的交响中,江南不仅书写着自己的发展故事,更在为中国乃至世界提供着现代化进程的另一种可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浣熊」人类学家和「独角兽」人类学家

刘群

2025年凤凰好书1-2月榜
译林出版社
甘会斌、杨德睿译
[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著
《文化的阐释》

杰出的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她的“思想自传”《我以文字为业》中,谈及了1994年4月,她前往西雅图北部的刺猬溪小住一周的经历。这次行程相当不凡,因为刺猬溪是一个“只接受女性”的作家共同体,在这里,女作家得以释放掉外部世界的任何压力,将时间纯粹地投入自己的写作和阅读。在这次短暂的停留中,勒古恩似是有意地带上了两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和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作品。她在第三天就读完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却颇为直接地表达了自己不喜欢格尔茨。“格尔茨之于列维-斯特劳斯,就像浣熊之于独角兽。”

列维-斯特劳斯和克利福德·格尔茨可能算得上是整个观念史上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在20世纪,如果说有哪位人类学研究者的影响力延伸至学科以外的领域,那么,列维-斯特劳斯的是一位,格尔茨则当仁不让紧随其后。然而,为什么勒古恩会称格尔茨是“浣熊”,而将列维-斯特劳斯比拟作一只尊贵的“独角兽”?一位“浣熊”人类学家和一位“独角兽”人类学家,在思想上、在研究取向上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样一种近乎图腾式的类比,又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合法性呢?

实际上,在格尔茨的代表作《文化的阐释》中,这位符号人类学巨匠就曾撰写过一篇精彩文章,专门论述他那位里程碑式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者的评价。文章的标题是《理智的野蛮人》,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隽语或可透露出一点格尔茨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这位法兰西学院的知识明星,是一个浪漫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混合体。

独角兽的名号,也许特别适合身为神话学大师的列维-斯特劳斯。独角兽是神话中的神秘生物,一种在现实中不存在的高贵动物,优雅、完美,是理想化的象征。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它常常作为基督的化身,寓意着某种精纯的、超越性的秩序和逻辑。勒古恩显然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文字操控者,称列维-斯特劳斯为“独角兽”,既别出心裁,又格外准确。

而在格尔茨的述评中,他同样赞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大无畏和一种无所顾忌的坦率”。在他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身上始终携带着一种自我拯救和自我毁灭并存的矛盾性。一方面,法国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世界,一步一步如探险英雄般深入巴西雨林,恰如那步入花园的独角兽(想想那些中世纪独角兽挂毯);而另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追寻的是一种超越经验多样性的、普遍的、永恒的、抽象的深层结构,他试图“在经验事实中发现规律性关系”,沉入表层描述之下,用一种思维科学来解释某种四海皆同的人类心智的基本运作方式。

这恐怕是一种独角兽的炼金术。格尔茨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戏法难掩讽刺的态度,他称其为“一架地狱的文化机器”。在列维-斯特劳斯眼中,人类具体生活的种种文化模式仅被当作深层观念结构浮现于表层的图案与花样,

而人类学家的职责是穿透表层,重构内在于我们所有人的“野性思维”中的有限的深层结构及系统,并将其归类成一种便利的分析图式。这让人想起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又或是林奈的植物分类学,或者再遥远些,如普拉特所说的“天堂里的亚当”。但格尔茨直言,当人们欢庆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做法将人类学提升至一门逻辑的、理性的、智性的实证科学时,这实则是一次“精心伪装的逃避”。这位卢梭的传人像他的先辈一样,只关心大写的人(Man),而似乎不在意复数的人(men),他回避去直面“特定丛林里的特定野蛮人的特定思维”。他以一种沿袭自法国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主义,追逐着某种所谓原生的人类思维的金光——可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却无力支撑起在多元性世界中的“身体的相逢”。独角兽在灵魂深处狩猎。

另一方面,很难明确说出勒古恩在此处用“浣熊”来指称格尔茨的具体缘由(考虑到她此时正居于美国西北部惠德比岛海岸的森林中,也许这只是她的灵光一现)。但无论如何,浣熊是北美常见的一种哺乳动物,它并不是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具有神性的形象;相反,它亲近土地,机敏狡黠,适应力强,是一种尤为擅长利用源自土地的智慧与资源的生灵。

的确,勒古恩对格尔茨有一种爽直的偏见,她毫不隐藏对这位普林斯顿人类学家的不满,似乎认定他是一个“自诩聪明”“装腔作势”的学术精英分子。但“浣熊”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切中正题(格尔茨可能要说这是牵强附会)。如格尔茨所言,进行文化阐释的人类学家的专业实践并不是要“回答我们的最深层问题”,而是要“让我们能够获得其他人……已经给出的答案”。阐释人类学的使命,首先是亲近人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及其必要因素,然后记录与理解。它的目的不是探求定律,它希望收获的是“浓厚”的意义。

在《文化的阐释》中,格尔茨将人类学的主要课题——文化,限定为一个符号学概念:文化是人自己编织并悬挂其上的意义之网。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阐释那些富有意义的社会表达,而其途径便是做民族志。正是在这里,格尔茨留下了他对整个人文学科最独特的贡献。他指出,民族志就是“浓描”(thick description),亦即对人类行为中层层叠叠甚至相互纠缠的表意结构进行浓厚的描述,以透露出一点这些行为的意义何在。这些结构可能“陌生、不规则而又含糊不清”,因为旅行的人类学家先前并不熟悉那个特定的世界。但是,人类学家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和耐心去接近它们,去书写它们,并进行解读,这样的解读基于本地人“就他们本人及其同胞所为之事所做的解释”,依据那些人“自身的平常日用的框架”。格尔茨称此为构建“行动者导向”的描述。人类学不是以我们的方式去理解,先得出自己的阐释,随后将之系统化,找出某种一般的、统一的、遮空蔽日的秩序原则。因此,对格尔茨来说,民族志的要义还在于,是在微观的。浣熊来到人类的都市,在最接近地面的地方谋生,但它却可以“极大地知悉极细小的事情”。人类学家在如此平凡的背景中,发现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内容。

通过“写下特定社会行动对采取该行动的希望者所具有的意义”,格尔茨希望“尽可能明确地陈述,这样获得的知识……对社会生活本身,说明了什么”。正是这样,格尔茨最终给理论找到了位置,他仿佛指明了人类学的某种实质:它不在乎独角兽般的圆满与纯洁,而存在于具体的、精微的、多样的真实人类生活之中。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编辑